



主持人孙华:12月7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7.8%,连续6个月实现同比增长。今日本报围绕支持稳外贸的财税政策、引导加工贸易在国内梯度转移、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给予解读。

一揽子税收政策掷地有声 “真金白银”助力外贸企业持续回稳向好

■本报记者 包兴安

12月7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7.8%,连续6个月实现同比增长。我国外贸持续回稳向好,一系列“真金白银”的减税降费政策贡献了力量。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外贸持续回稳向好,税收支持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根据国际形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分析,我国外贸在未来还会持续向好,对外贸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应继续保持稳定、连续,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持续减轻外贸企业负担,帮助外贸企业盘活资金。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对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申报出口,因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原因,自出口之日起1年内原状复运进境的货物,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出口时已征收出口关税的,退还出口关税。

除了上述措施,今年以来,我国还出台了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提高1400多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扩大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范围、免征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税款缓税利息等;同时,税务部门帮助企业用足用好出口退税政策,从增进出口退税便利化、加快出口退税速度等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促进出口退税提速增效。

张依群表示,我国连续多年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国家对外贸出口企业给予更大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出口退税规模,增强出口退税便利,减缓出口企业资金占压,极大增强了外贸企业活力,为外贸回稳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上海制皂有限公司积极扩展国际市场,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亚、非洲,但随着境外疫情持续蔓延,企业面临国际业务锐减、渠道开拓受阻等系列难题。因国外港口关闭影响返单,今年上半年企业的外贸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5%。与此同时,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增加了产品的成本,企业产销两端都面临一定压力。



“减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税收优惠政策为下一步研发创新和品牌推广增加了资金储备。”上海制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德雄表示,今年以来,公司已投入625万元用于产品创新、推广,购进价值35万元

的高级液相色谱仪等测试设备,节约的资金转化成了科技创新的生产力。巨丰投研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实施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减轻了外贸企业负担,增强了发展信心和动能,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地应对新形势,实现企业的突围和新发展。

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 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

■本报记者 杜雨萌

12月7日,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9.04万亿元,同比增长1.8%,呈现持续向好、高速增长态势。

“6月份以来,我国出口持续保持正增长,尤其是在近期全球出口整体仍处于3%至5%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出口数据显得尤为强劲。”东方财富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我国稳外贸的政策效果超出各方普遍预期。究其原因,这主要受国内外产能修复错位、大量订单向

中国转移等因素有关。当然,这背后亦是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政策加大对出口企业支持所带来的显著成效。

譬如,今年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中,共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其中着重提到,要“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支持力度”。

具体来看,《意见》提出,培育一批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共建的加工贸易产业园区;借助中国加工贸易产品博览会等平台,完善产业

转移对接机制;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发挥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

王青表示,在疫情影响下,如何稳住我国出口的产业基础,不仅关乎稳外贸,而且还与稳就业及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直接相关。为此,《意见》要求培育一批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共建的加工贸易产业园区等措施,旨在充分利用东部与中西部、东北地区之间的成本梯度差异,在一段时间内引导东部部分出口导向型产业优先向这些地区有序转移,避免短期内大规模产业外迁影响国内就业形势。同

时,这也能给承接地区带来新的产业增长点,缓解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而就稳外贸本身而言,引导加工贸易在国内梯度转移,短期可以避免大量外贸订单流失,进而稳定我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

12月5日,内蒙古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暨招商引资产对接会在呼和浩特市正式举行。据悉,在此次对接会上,现场参会代表与线上多家企业通过“云洽谈”进行了深入的对接交流,并签订9项合作协议,协议投资额达22.4亿元。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在接受《证券

多项举措加持 新业态为我国外贸增长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苏诗钰

见习记者 杨洁

“疫情影响下,外贸数字化加速,特别是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以及海外仓等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外贸的影响,对稳外贸、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所副部长刘向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1873.9亿元,同比增长52.8%;市场采购出口5098.6亿元,同比增长35.5%。

暖心数据离不开政策支持。今年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提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措施,其中在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方面提出,尽快推动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增一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充分

利用外贸发展专项资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现有渠道,支持跨境电商平台、跨境物流发展和海外仓建设等。在拓展对外贸易线上渠道方面提到,推进“线上+线下”支持,支持和鼓励有能力、有意愿的地方政府、重点行业协会举办线上展会;用好外贸发展专项资金,在规定的范围内,支持中小外贸企业开拓市场,参加线上线下展会等。

1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创新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

“外贸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实现转型升级尤为重要。”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是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升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这需要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配合。另一方面,则

是要在拓展外贸渠道,创新外贸方式,提升外贸服务上下功夫。外贸新业态正是在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不断为我国外贸增长提供新动能。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也在紧锣密鼓地出台多项举措助力外贸企业。6月份,江苏省“江苏优品·畅行全球”系列线上展会启动,通过阿里巴巴、焦点科技、环球资源等平台企业合作,举办20场线上国际展会和2场线上出口转内销展会。7月份,山东省出台《关于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意见》,提出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外贸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数据显示,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103.4%,今年前三季度达到149%,今年前三季度出口额超过上年全年。9月份,黑龙江省“外贸优品汇 扮靓步行街”出口产品内销系列活动启动,旨在帮助外贸企业拓展市场、推广产品、打造品牌

的同时,让更多的市民百姓乐享身边的高品质消费,实现稳外贸与促消费工作的互促推动。

在董忠云看来,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可以说是为支持中小外贸企业量身打造的。一系列措施和相关服务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门槛,为中小企业走出去,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进而对我国稳外贸,以及通过保中小企业这一重要的市场主体来保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11月1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曾介绍,前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创新监管方式,已经出台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零售出口无票免税及所得税核定征收等80多项支持政策,复制推广了12方面36项成熟经验做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已扩大到86个

城市 and 海南省全岛;目前,各综合试验区备案主体已经超过14万家,各综合试验区企业已建设海外仓超1800个,服务范围覆盖全球。

谈及未来在发展外贸新业态,培育外贸新动能方面还需如何发力?董忠云表示,首先,政府各部门应继续加强调研,深入挖掘中小企业开展外贸业务过程中的实际需要,从通关便利化、税收优惠、金融支持、外汇管理、政府服务等多个方面对跨境电商、外贸综合服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其次,应进一步利用大数据、AI、云计算等新技术改造优化贸易链条,加大力度建设智慧物流、仓储、数据传输外贸基础设施。第三,针对未来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应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的包容度,相关部门应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最大限度支持外贸领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我国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外贸企业、外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张依群说。

资产管理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加油站与修理厂

——专访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

■本报记者 闫立良

见习记者 郭冀川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经过二十年发展,在支持银行改革和帮助企业纾困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随着政策性任务的基本完成,AMC行业进行商业化转型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资本市场衔接必不可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吴庆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吴庆表示,随着各省设立AMC,地方AMC数量已经突破50家,收购和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迅速提高,竞争也随之加剧。在产能快速提升后,AMC需要更加高效、更加便捷、多样化的退出通道。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好的退出通道。

情有一个称呼叫“三打”:打包、打拆、打官司。银行把多个不良资产放在一起打包卖给AMC,AMC与银行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双方接受的打折率,最后AMC主要通过司法(打官司)途径向债务人追缴欠款。”吴庆感慨道,这个过程几乎不增加价值,AMC只是不良资产的搬运工。一些有可能增值的资产甚至在“三打”过程中被消耗掉了。商业化转型让AMC拥有更加灵活的资产处置方式。

吴庆认为,很多发展遇到困难的上市公司和中小金融机构,如果给予外力进行救助,或者通过一些市场化改造进行转型,将很大程度地提升价值,这远好于破产重整。

吴庆说:“AMC就像一个加油站,助力中小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的转型升级。像一个修理厂,对落

后的、将要被淘汰的资产进行修理完善,让其重新进入经济体系,这种处置不良资产的能力,是AMC责无旁贷的任务。”

而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得不良资产,在资产重组优化后如何让其独立发展,吴庆表示,资本市场是重要的入口和出口。

伴随着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AMC已经从政策性出清不良资产向商业化转型,逐步发展成为以不良资产为主业,救助中小金融机构为特色的综合性金融机构。其所处置的资产从银行资产扩展到整个金融和非金融资产,施以援手的对象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

吴庆也指出,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上市公司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一方面需要减负前行,另

一方面需要引入新的优质资产。AMC在盘活存量 and 化解风险的功能上,是其他金融机构不可替代的,也是众多上市公司转型的主要助力之一。

吴庆说:“金融体系的一个应有的特性就是实现金融资产循环,不良资产处置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经过AMC处置之后的资产应该配置到最能发挥其价值的地方,而资本市场正是优化金融资产配置的场所。”

吴庆认为,未来AMC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发挥其专业优势并完善其独特功能,更好地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利用资本市场提供的金融工具和渠道必不可少。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在不断进行改革探索,但吴庆认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对实业不够

了解,以至于既不能很好服务实体经济,又不能有效地把控风险。

让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紧密结合,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开放和鼓励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吴庆认为有一条红线不可逾越,那就是资本充足率,这也是巴塞尔协议中,不断提升的关键指标。

吴庆说:“巴塞尔协议在国内受到不少抱怨,认为它约束了创新。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是当前最先进的金融管理理念和规则,它总结以前所有金融危机中的问题和教训,充分权衡利弊,提出用资本充足率控制风险。”

在金融机构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下,吴庆认为可以进一步放开监管限制,让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实体经济。

年内证监系统发268张罚单 信披违规和内幕交易占比超七成

■本报记者 孟珂

自新证券法施行以来,对内幕交易、信息披露违规等行为的处罚力度明显加强,资本市场法治环境进一步优化。《证券日报》记者据证监会网站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截至12月8日,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共开出268张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邮证券首席研究官尚震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证监系统罚单增多的根本原因是监管层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会议精神,在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进程中,更加严格规范市场行为,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清除障碍。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建立在强大的资本市场动力引擎基础之上,这是监管层在新时代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从处罚类型来看,在268张罚单中,涉及信披违规的共103张,涉及内幕交易的有89张,信披违规和内幕交易罚单合计192张,占比为71.64%。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南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证监系统罚单数量增多体现监管部门在严格落实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提升稽查执法效能,加强投资者保护。

对于如何防范内幕交易和信披违规行为?尚震宇认为,最有效的手段是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并且追溯历史经济责任乃至历史刑事责任,使其得不偿失,从而形成巨大威慑力。改进侦查技术手段,优化检测算法,扩大稽查调查数据的范围与权限,使其交易与资金动向一览无余。

何南野认为,进一步防范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一是上市公司要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要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前进行预警和防范;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要建立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信息披露机制,做到专人负责,严格控制信息知悉范围;三是监管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对直接责任人要施以更为严格的处罚,同时,对典型案例要进行公告,以负面案例对内幕交易和信披违规等行为形成有效震慑。

11月6日,中国证监会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12起证券违法典型案例。其中有6起证券违法典型案例分别是:雅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华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廖某操纵证券交易案、通某投资公司操纵证券市场案、周某和内幕交易案、吉某信托公司内幕交易案。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内幕交易、操纵股市等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何南野表示有以下几点:一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与大资金存在某种形式上的关联性,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输送;二是与自媒体、微信群等新型渠道相结合,波及面更广,危害性更大。

谈及即将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背景下,资本市场中哪些“毒瘤”需铲除?何南野表示,注册制的核心,在于信息的充分披露,因此,注册制下的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这对上市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其能进一步改善信息披露方式,实现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充分性和准确性,让资本市场及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的各项情况变化。

尚震宇认为,未来违法违规行为会借助科技升级变得更加隐蔽,比如动态IP下单交易技术使得监管检测更加困难,操纵市场行为可能通过金融衍生品嵌套运作。

预防措施方面,尚震宇建议,不断优化侦测算法,根据扩大调用的数据范围,动态实时监测,一旦发现,追本溯源,绝不放过,并根据审讯结果,优化监测算法。

(上接A1版)

第三,推动互联网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各类消费场景,过度营销贷款或类信用卡透支等金融产品,诱导过度消费。有的机构甚至给缺乏还款能力的学生过度放贷,出现违约之后进行强制性催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此,银保监会坚持对同类业务统一监管标准,坚决制止监管套利。

第四,弥补数据隐私保护制度漏洞。一些科技公司利用市场优势,过度采集、使用企业和个人数据,甚至盗卖数据。这些行为没有得到用户充分授权,严重侵犯企业利益和个人隐私。为此,《民法典》明确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国家层面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金融数据安全保护条例,构建更加有效的保护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面对金融科技的持续快速发展,郭树清表示,将坚持既鼓励创新又守牢底线的积极审慎态度,切实解决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第一,重视网络安全问题。目前,中国银行业务离网交易率已达到90%以上,金融服务对网络高度依赖。相对传统风险,网络风险扩散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突发性网络安全事件也会对金融机构的应急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二,促进更公平的市场竞争。金融科技行业具有“赢者通吃”的特征。大型科技公司往往利用数据垄断优势,阻碍公平竞争,获取超额收益。传统反垄断立法聚焦垄断协议、滥用市场、经营者集中等问题,金融科技行业产生了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可能更多关注大公司是否妨碍新机构进入,是否以非正常的方式收集数据,是否拒绝开放应当公开的信息,是否存在误导用户和消费者的行为,等等。

第三,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少数科技公司在小额支付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涉及广大公众利益,具备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特征。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各类金融和科技领域,跨界混业经营。必须关注这些机构风险的复杂性和外溢性,及时精准拆弹,消除新的系统性风险隐患。

第四,明确数据权益归属。中国政府已明确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数据确权是数据市场化配置及报偿定价的基础性任务。目前,各国法律似乎还没有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大型科技公司实际上拥有数据的控制权。需要尽快明确各方数据权益,推动完善数据流转和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公平合理地利用数据价值,依法保护各交易主体利益。

第五,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协调。中国近期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尊重他国主权、司法管辖权和对数据的安全管理权。银保监会将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原则,与各国加强协调合作,构建更加开放、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